



现代散文的 阐释空间

吕若涵 | 著



 人民出版社

现代散文的 阐释空间



I 207.65

65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散文的阐释空间/吕若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729-1

I. ①现… II. ①吕…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811 号

现代散文的阐释空间

XIANDAI SANWEN DE CHANSHI KONGJIAN

吕若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05 千字

ISBN 978-7-01-014729-1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中文系的本科生,全部从旗山迁回仓山老校区了。当初迁往新校区,舍不得老校区;现在对新校区却又有些留恋了。福州素有“左旗右鼓”之称,鼓,即鼓山;旗,就是旗山,旗山在乌龙江南岸。如果不是太赶时间,上课前早个二十来分钟到达新校区,恰好碰上空山雨后,青山如洗,白云绕舞,“逶迤飞动,如旗之风靡”,此即旗山也!一时神情大为清爽。就人文言之,溪源江水紧贴校园而过,沿溪上溯,有溪源宫。乌龙江岸,有旧侯官市,“庙踞鼃鼃石,神依土木丛”;“日泻帆光澹,江澄塔影寒”,遗迹犹然可寻。明朝林春泽,居旗山北屿,历成、弘、正、嘉、隆、万六朝,正德进士,活了一百又四岁,有集曰《人瑞集》,子嗣后人,多有文名且长寿;瓜瓞连绵,五六百年来,水西林一直聚族而居。

老校区,又称仓山校区。仓山,即藤山,古名瓜藤山,后贩盐者割为私仓,遂称仓山,其名沿用至今。藤山,在闽江南岸,西起上渡,东至中洲,连绵五里,以其地多种瓜,瓜有藤,故名。藤山北岭,旧有天宁寺,南宋李纲谪居于寺之松风堂。明代藤山人周仕阶,嘉靖举人,仰慕李纲为人,自号天宁居士,其诗集名《周天宁先生诗选》。其子之夔,崇祯进士,重修松风堂,入清不仕,有《弃草集》。藤山北望,一水之隔,有晚清林纾的苍霞精舍。藤山南麓,旧时岁杪,郡人载酒来游,人称梅坞。“藤山梅万树,冬尽一齐开”;“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此明代文人咏藤山梅之诗也。福州开埠之后,梅坞徒存其名,代之而起的是教堂错绣,领事馆比肩而立,“千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下”。民初,国民政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曾就读于英华学校,风风雨雨,如今林公馆修缮一新,青砖瓦舍,掩映于高楼之中,也是藤山的一道风景。

予生也晚,不及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校调整,自然也没有见到福建师范学院在藤山山麓挂牌的盛况。青砖学生宿舍,地板嘎吱作响的筒子楼,通往音乐系的小木屋,遗世独立似的教工之家,短道游泳池,已经无处寻觅。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总是千方百计想在校园中寻找过去的那些记忆,你可以指着两座八层楼高的研究生宿舍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您住过的青砖楼,还是叫十四、十五号楼,记忆与现实,两者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但是,当您兴冲冲去寻找短道泳池,路径找不到了,即使有识途的老马领着您去指认,面对建筑群,您只能茫然不知说啥是好。

建筑传统可能有中断,这对一所学校似乎关系不是特别大。况且,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如老华南建筑群还在,老音乐系建筑群也还在。比起建筑,一所大学、一个院系,文化学术传统的承传要重要得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集中推出三套丛书,其中两套分别以两位学科奠基人,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第二任系主任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斋名——六庵、桂堂命名,用意了然;另一套取名“藤山”,似也有看重文化积淀、学术承传之意。

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道德文章,其他两套书的序言都有精辟介绍,兹不赘。说起老中文系的旧事,我曾经在《听彭一万讲五十年前事》略有述及,彭先生知道的比我多,体会也比我深刻。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件旧事,一件近事。

十五年前,我编光泽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偶然接触到黄曾樾教授(1898—1966)的生平著述。20 世纪 20 年代,黄先生在福州文儒坊拜石遗老人为师,治诗古文,石遗老人每有讲授,黄先生退而录之,结为《谈艺录》一书出版,30 年代中华书局已经印了 3 版。石遗老人论闽古文家,首推朱仕琇,高澍然次之。朱氏有《梅崖居士文集》传世,而高氏古文尚无刻本。黄先生不忘师训,十多年间,不断搜集高澍然古文 160 多篇。黄先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1943 年,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黄先生供职驿政,也到了永安。日机空袭山城,“每遇警报,挟册而行”,就是说,每当空袭,黄先生随身带的就是他搜集到的高氏之文。黄先生又想,万一躲不过空袭,人亡稿毁,挟册而行,并非上策。先生遂于 1944 年将高氏古文编成《抑快轩文集》上下两卷,自费在永安印行,公诸于世。

一件近事,前年,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同时馈赠两部文集。一部是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另一部是郑宝谦先生的《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或它的前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书都有卢馆长作的《序》。

包树棠(1900—1981),福建上杭人。著《汀州艺文志》,六十万字,为研究汀州文化、艺文不可或缺的著作。包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建国之后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汀州艺文志》动手于1925年,完成于1930年,为其少作,除了《自序》一文发表在1930年《厦大周刊》上,全书生前未曾刊布。

郑宝谦(1938—2014),福建福州人。郑先生先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外文系,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华侨大学,1973年之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大家知道郑先生曾任教于历史系,然而,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作者介绍,先生还曾在中文系任过教,看到这一介绍,让人汗颜,我们对中文系的历史了解实在太少。《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皇皇一百四十万字,其学术价值,金云铭、黄寿祺、熊德基诸前辈言之详矣。《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出版不到四年,郑先生今夏在孤独中溘然长逝,不觉为之唏嘘。

这两件旧事、近事,都和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关。黄曾樾先生获得国外博士学位之后,仍然不忘师训,一直念叨着他的老师,继续搜集研究高澍然的古文,难能可贵。老师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学生固然可以另辟蹊径,但是老师有益的教诲,学生可能会受用一辈子,我自己便很有体会。包树棠教授,毕业于“国专”,在强调学历学位的今天,“国专”,算什么层次?其实,身份不一定都那么重要,《汀州艺文志》1930年完成,2010年出版,书稿完成时包先生还是一位年轻学人。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年,出版距离先生谢世也已经三十年!一部浮浮躁躁而产生的所谓著作,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吗?郑先生的生活是孤独的,学术也是孤独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的作者介绍,没有职称,似有为智者“藏拙”之嫌,其实公开介绍郑先生是副教授,又有何妨?一位副教授,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出可以传诸于后人的著作,我们这些有幸忝列教授行列的教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在学术上更高地要求自己,免得后人指指戳戳吗?

收入本套丛书的作者有:黄黎星、余岱宗、陈卫、吕若涵、郭洪雷、郗文倩、刘海燕等,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边到五十之间,都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当我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跃然于我的眼前。

比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的学术已经成熟,有比较丰富的积累;比起六十边上或更老的“老教师”,他们则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思维敏捷,出手快。他们是文学院各学科的中坚,承上启下;文学院的将来,首先靠的也是他们。文学院一下推出三套丛书,可能是出于作者归类的方便。何况,我上文说过,教授的论著,不一定就一定比副教授高明;同样,不是博导的教师,也可能写出比博导好的论著。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我虽然未能全部读完,但可以肯定,大家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已经做出成绩。随手举一个例子,郗文倩著作中“鱼龙曼戏”一章,即便我能写得出来,恐怕也不会如此精彩。文倩研究的领域我比较熟悉,故举以为例;其他几位的著作,也许更为突出也未可知。我强调遵从师训、学术承传,但也相信,中青年学人,一定会做得比前人、比老师更好,这样,学术才会进步。

本丛书的作者,都已经不是只出过第一本书的“新人”了,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可能是他们的第二本、第三甚至第四本了,长足的进步,说明文学院很有希望。2012年,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书达40万种之多,2013年44万种,在出版如此繁荣的状况下,一本新书要超凡出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郑宝谦先生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都足以传世。本丛书的作者(当然还有我自己)都得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包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是在完成八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比起包先生,我们幸运得多,出本书似乎不是太难,但是,八十年之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今天出版的这部书?假如有人读我们这部书,会有什么反映和评价?我想,如果这套丛书有若干种足以传世,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那么我的序也就可以附之而不朽了,甚幸!

汉代,藤山草莱未辟,直到晚唐,此地方有民居。如今阡陌扑地,歌吹沸天,已为福州一大奥区。文学院将本丛书名为《藤山述林》,如前所述,取名很有文化意蕴。文学院本科生都从旗山迁回来了,假如本科生不回迁,却把研究生也迁过去,丛书该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说,那就叫“旗山述林”吧!谁又能保证,文学院不会再有迁往旗山的那一天?其实,旗山也很不错,那里空气好,山青水绿。

陈庆元

公元2014年8月24日于藤山华庐

自序

文学史或文学史论须建立在具体的、微观的、感性的、丰富的、细致的作家作品研究基础上,也不排斥将个人的鉴赏品味带入文学史中。但无论微观品鉴还是宏观观照,理论将可能成为一块磁石,让散落的细砂靠拢归位;理论也可成为一把利器,让解析者与阐释者得心应手;理论的广度与深度,可能用自身的灰色反射出文学的斑斓,以自身的抽象与条理演绎文学的感性与多姿。这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在各种诗学/哲学/史学理论面前痛且快乐着的原因吧。在散文方面,如何建构现代散文文类文体理论,如何继承中西散文传统并进而创新,总是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终极目标,尽管那些心怀所谓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多半会遭致怀疑与否定,但“散文学”的命题和它那灰色的理论阴影,却随时笼罩在他们头顶,沉重而挥之不去。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以作家风格论和散文流变史来呈现微观与宏观、个案阐释与纵向梳理的为多;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研究则以观念、文体、论争与批评为内容;至于涉及现代散文流派、社团和刊物的研究,则还是以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加以统摄。需要提到散文文体理论建设方面,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尤其丰厚:如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现代闲话风散文的理论辨识、周作人对韩愈式古文的批判、俞平伯林语堂等对晚明小品的赞扬、林语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小品文理念以及对“西洋杂志文”的倡导、现代作家对日本随笔、英国随笔等的译介,一直到60年代将杨

朔、刘白羽、秦牧的抒情散文模式大加推广,八九十年代则着重于“大散文”和“艺术散文”的文化批评与文体探索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散文学的建构和广泛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年来,一些中青年研究者有感于散文理论研究的匮乏,将研究触角伸向理论领域,试图从新的理论角度重新讨论散文发展中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的关系,这种理论自觉,正是为了弥补现代“散文学”的不足。当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由于近三十年学界普遍关注中国百年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因此,不少研究专著从厘清与散文文类相关的“随笔”“杂文”“小品文”等概念入手,但稍作文体辨析后往往又回到对现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创作理念、精神心态的分析路向中;现当代散文理论发展中种种不平衡或缺失十分明显,如一些理论流派未及繁荣或构成理论体系即被中断;学界和出版界对西方随笔的理论译介尚属零星和片断,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者面对中国自身的散文理论资源和优良的文论传统,如何继承发扬或实现其现代性转换,也一直存在研究瓶颈;部分研究者虽然开始涉及现代散文体式与语体(如游记、序跋等,如闲话风、独语体、“杨朔体”等)的研究,尝试将叙事学文体学方法运用到“散文学”上,但在文类研究的自觉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显得不够。

这或许表明,我们缺少从源头开始的反思:散文的文类意义似乎总是不证自明的;散文的“现代性”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中国古代文学学者们批评着、反思着“‘五四’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遮蔽’”^①时,我们很少看到以“五四文学”为骄傲的现代文学界的回应,以及作出及时的、有效的学术讨论和历史反思。而检讨20世纪以后“杂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重新探究古代文章学与现代散文的关系,讨论散文的文类界定以及散文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走出现代散文研究的理论困境。

散文的文类意义并非不证自明。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发展来看,文学的分类体制严整分明,文论家们多以厘清各种文体特征为己任: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习惯于分体而论,《诗》、《骚》、词、曲,虽都是广义

① 王水照、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的诗歌,但人们往往分而治之,分体、分时代、分流派,避免了一锅煮;对中国散文,古文文体复杂且种类繁多,因此也特别讲究规范,刘勰论文未尝不是如此。在六朝,“文笔说”颇流行,《文心雕龙》中也使用过,但刘勰并不专篇论文、论笔,因为以文、笔论之必然杂乱,故置而不论。《文心雕龙》中有“杂文”篇,实际上是论那些不好归类的文体,因为“杂文”本身还不是独立自足的一种文体。再如《古文辞类纂》,郁达夫说它“曰论辩,曰序跋,曰奏议……一直到辞赋哀祭之类”,“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感激涕零的理由,一半虽在它的材料的丰富但一半也在它的分门别类,能以一个类名来决定内容”。^①但是,当文学观念因外力和内因交互作用而发生重大变革后,古代的杂文、随笔、散文,与现代文学中的杂文、随笔、小品文、散文等,就不再是能够严丝密缝地吻合的文体概念了。

这样,我们才会对20世纪初期一批试图用西方文学史标准来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致以“同情的理解”:既要“以‘纯文学’观念来改变功利的‘载道文学’”,又要接触并接受相对陌生的西方文类传统,既要坚持文章“启蒙”目的,又期待着散文在“文学殿堂”里也有一席之地,那么,困惑便难免,“欧洲文学史皆小说戏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闲入”,倘若如此,五经,诸子,史传这些中国文学中的正宗,岂不是要划出文学史外?直到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怎样拿散文韵文、叙事议论的概念,来归纳《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使两套名称达到有机的互换”^②等,还都是摆在中国文学史撰写者面前的难题。当周作人、王统照、胡梦华、李素伯、鲁迅、郁达夫、朱自清、梁遇春、林语堂等作家不断地写文章讨论散文、杂文、小品文、随笔的特征并论其功用时,表现出了对如何把握中西文类差异的焦虑与急迫——他们既要重新评判传统的诗文理论价值,不排斥“体辨源流”之传统,同时也希望能在“文学”的新架构中,建立起中国现代散文观念和散文创作的新式样。如此,无论是对“杂文学”、“纯文学”抑或“散文学”的探索与界定,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理论上出现各种混沌、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

② 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5页。

含糊和矛盾在所难免。

那么,五四开始的散文现代性追求能否与“纯文学”追求画等号呢?这也是今天仍然值得思考的问题。散文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将西方繁复的文学观念简约为“纯文学”观念,从而不加辨析地认定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就是纯文学性,继而将“艺术性散文”作为散文正宗,这样的结论既有其来源,也有其偏至。以对中国学界影响甚大的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一书为例,在这本坚持“艺术须有自己的某种框架”的理论书中,遵循的大体是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三分法,只在论述节奏与格律时,对既非散文也非诗的“节奏性散文”之艺术价值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其他时候,散文是否是文学,构成它的必要元素是什么,则说得含糊其辞。即便如此,作者在探讨与散文相关的文体、语言和类别问题上,还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文类界定的困难:作者说,倘若用文学的突出特征“虚构性”、“创造性”和“想象性”来界定文类,那么,西塞罗、蒙田、波苏埃或爱默生等人的作品岂不划出了文学之外?作者给出了一个有弹性的空间:“不可否认,也有界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例子,像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那样的作品就很难否认它是文学,另外那些伟大的神话主要是由‘创造’和‘虚构’的片断组成的,但同时它们主要又是哲学著作”,即使没有虚构性这一文学的核心,但“将一部伟大的、有影响的著作归属于修辞学、哲学或政治论说文中,并不损失这部作品的价值,因为所有这些门类的著作也都可能引起美感分析”^①。可见,讨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时,散文这一种类别显然较之其他文类更为复杂,在小说文类那儿适用的“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可能并不适用于散文。至于以权威著称的《大英百科全书》,则对“非小说性散文”的性质和形式作了更为宽泛的界定与分类,编撰者认为:“试图给非小说性散文规定一个单一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定义都有其局限性,或者是排除了精髓,无法适应非常广阔、多样的文学现象”,形式上则包括了“随笔”、“历史和批评的形式(作为文学的历史散文和批评)”、“教义,哲学和宗教的散文”、“政治、论争和科学的散文”以及报导、箴言和速写、对话、游记和书信体、私人文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4—15 页。

学等等。^①这种包容性极大的“非小说性散文”，看上去，是否与中国的“杂文学”有着诸多相近的分类与相似的形式呢？至少，用“纯文学”或“艺术散文”恐怕是不能够完全概括的了。把散文定位为“艺术散文”，必然将枝繁叶茂的散文家族缩略为一个小而无力的部落。

研究者要为散文下定义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对建构理论体系的追求，总是会像“鬼影”一样地抓住人们的心。谁不希望能从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或大字典里“一劳永逸”地找到关于散文的定义呢？但恰恰因为文学发展中存在无限可能性与独异的创作性，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作品的美学批评，理论上，每一个“概念”都注定了它最终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永恒不变，这才让以追新逐异为本能的理论家们能够从中发现各种文类的魅力，并在难以周全的缝隙处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当周作人写下《美文》这篇短短的文字时，尽管说得并不周全严密，却代表着那个时期他心目中对现代散文怀抱的“理想”。而今天人们说“美文”时，往往只是借“美文”的壳子自说自话，对“美文”内涵与外延则各有各的界定。这样的情形，在西方随笔创作和理论中同样也出现过。斯塔罗宾斯基曾在《我们今天如何定义随笔》一文中，以自己的创作经验，阐释蒙田的随笔，并希望抽绎出随笔的特质，从而为随笔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从他对“随笔”的定义来看，随笔纵然包容且富有弹性，却并不是简单、随意、零碎的文体，因此，斯塔罗宾斯基或许有意从蒙田的创作和思考来厘清“随笔”特质，意在辞退一众冒充的作品，使“随笔”不至于成为一个“大杂烩”。而他所说的，也仅是一个批评家和作家的一家之言。20世纪对欧美散文理论有着重大影响的卢卡奇、阿多诺等人，也在随笔内容、形式、语言方面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美学认识，卢卡奇题为《论说文的本质与形式》的文章，阿多诺题为《作为形式的随笔》，都将散文（随笔）的形式与内容归结为一，“形式”也作为散文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有“文无定法”之说，阿多诺在文章中则特别强调“随笔就是在不讲方法的方法中进行”，而这“法则”体

① 张梦阳：《〈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散文的诠释》，《散文世界》1985年第1期。

现的是随笔精神的核心：“随笔最深处的正式法则是异端。”^①来自西方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思考方式和各种文学观念，应当同中国悠久庞大的文章学体系一起，纳入今天散文研究者的视野中。

现代散文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理论变迁研究，也非单一的历史描述，而是由历史、理论和具体文本所构成的多维的立体的空间。如果转借卢卡奇与阿多诺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引申和期待，它既非逻辑的发展，也没有确切的终点，只有不断的重新开始，且包含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① 乔国强：《文学笔记·导读》，阿多诺《文学笔记》第一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内容介绍

中国现代散文比其他文类更为直接、明了、真实地触及着社会、时代的律动与历史的种种面相，它是写作者精神追求与灵魂呈现的重要载体。本书的散文文类概念趋于宏阔，所辑论文则以现当代散文作家、散文文体、散文刊物、散文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史料、论证严谨、视域开阔。研究中主要采用历史与美学、批判与同情、史料甄别与文本细读、文类理论与文体辨析相结合的视角与方法，对五四时期散文的“纯文学”想象与实践、30年代“论语派”散文的审美个性、40年代上海沦陷区期刊散文的特异现象以及最近30年两岸三地的文学思潮和散文特点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学理的研究。本书作者运用史料力求冷静与客观，但也笔端常带感情；在认同散文创作风格多元化的前提下，保持个人的阅读趣味与雅好；无论是潜入历史的纵深与幽暗处，还是面对当下创作的纷扰与杂乱，都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凸显自己的研究特色与学术追求。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东方天地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现代散文的审美特质

五四“纯文学”的想象与实践

——以五四时期书信体散文为例 / 3

“隐逸的诗”和“日常生活的诗”

——俞平伯、朱自清散文的比较研究 / 16

驳杂与秩序：林语堂散文的另类解读 / 33

静逸闲趣：论语派散文的精神意象 / 45

坚持与逃逸：论语派作家的精神困境 / 57

现代性个人主体的坚执

——论周作人及论语派的自由理念 / 70

论上海沦陷区女性散文的审美特质 / 82

第二辑 嬗变的思潮与散文期刊

三十年代小品文热的文化学透视 / 95

“论语体”：“合法主义”反抗与话语空间 / 110

三十年代老舍的文坛关系网络及其小品文创作 / 130

论林语堂的“西洋杂志文”理念 / 144

流风余绪：林氏期刊模式在上海沦陷区的承传与变异 / 156

借古话今：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史随笔——以《古今》为例 / 169

革命：在巴金的历史叙事中 / 186

第三辑 两岸三地:散文现象与理论思考

更传统与更现代:余光中散文论 / 201

论苏雪林的现代散文批评 / 213

女性主义与现代主义: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综论 / 226

反讽与渴望:新世纪散文创作的理论思考 / 237

“怀旧”主题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脉动

——以最近二十年的香港散文为例 / 250

百年中国散文:作为一种文类的研究 / 269

后 记 / 292

第一辑

现代散文的审美特质
